

地缘政治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杨焰焯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 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联系。地缘政治环境决定国家安全的基本面。地缘互动关系影响国家间的安全关系。地缘政治结构制约和影响国家间的安全关系。

[关键词] 地缘政治; 国家安全; 影响

为国家谋划安全是地缘政治学的主要使命, 地缘政治理论在西方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是安全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分析视角。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联系。

一、地缘政治环境决定国家安全环境的基本面

地缘政治环境决定国家的安全环境。斯皮克曼说过: “要决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政策, 那就必须考虑国家的领土在世界上的位置、领土大小和资源以及其它国家的领土和实力分布等情况。”^[1]

(一) 空间位置关系对国家安全环境的影响

“地缘政治环境首先表现为国家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国家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可以分为相邻(接壤)、相望(近而不接)、相隔(隔海为邻)、远隔(可被波及)、其它(难以波及)五种情况”。一般认为, 一国所处的空间位置关系会使国家享有优势或处于不利地位, “地理位置仍然决定一个国家近期的优先目标”。^[2] 国家毗邻的国家越多, “与各国间因边界、领土、民族、宗教等产生纠纷的可能性就越大, 其国家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和变数必然随之增多”。^[3] 比如, 美国有着天然的无可比拟的自然环境, 两边是广袤的海洋, 上下是两个弱小的邻国, 优越的地理位置给美国提供了非常安全的周边环境。相反, 中国周边接壤的国家多达 14 个, 安全环境最为复杂多变。莱维斯·理查森(Lewis F. Quarrels)认为, 国家的边界长度与该国的交战范围之间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一般情况下, 边界越多导致的战争就越多。哈维·斯特尔(Harvey Starr)和本杰明·莫斯特(Benjamin A. Most)也认为, 一个国家更可能从邻国而不是相距遥远的国家那里感受到威胁。拥有广阔边界的国家面临一个安全上的两难困境, 即它们要对付的具有侵略性的邻国不止一个。^[4]

由于技术的进步,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地理环境对国家安全环境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例如, 尽管美国地理位置优越, 但是跨越洲际的导弹技术发展起来后, 大大削弱了地理因素为美国提供的安全屏障, 使美国变得同样容易遭受攻击。在远洋航行技术发展起来以前, 海洋是很多国家安全的最好保护屏障, 而在远洋航行技术出现以后, 这些国家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受攻击。印度三面环海, 历史上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北方, 所有的侵略也都来自北方。远洋航行技术发展起来以后, 其安全威胁转移至南方, 英、法等殖民者都是从海上来的。

(二) 实力对比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地理位置、疆域、地形、人口、资源等是构成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地理基础, 而国家综合实力又是构成国家权力的基础和根源。现实主义“实力政治”认为一个国家的权力越大, 越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固的东西, 莫过于不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和声誉了。”^[5] 因此, 国家不断积累实力, 追求在与别国尤其是与相邻国家的实力对比中, 占据上风, 以拥有更优的安全环境。相反, 如果在与它国的实力对比中, 落于下风, 地缘政治环境就会恶化, 国家的安全形势就不容乐观, 就会出现“强者为所欲为, 弱者将忍气吞声”的局势, 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历史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尼古拉斯·斯巴克曼曾说过, 唯有强权才能实现对外政策的目标。国家权力的大小, 决定着国家的外交质量和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的大小。

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 国家为保障安全而采取的措施, 会降低其它国家的安全感。即使这个国家增加军备是出于防御的目的, 但是由于国家之间相互恐惧、猜疑和不安全感, 每个国家都会加强军备以寻求安全优势, 结果就会导致“安全困境”。这样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实力政治中的国家难以摆脱的一种困境。特别是当国家之间的实力发展不平衡, 技术因素加速权力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时, “安全困境”更加突出, “不稳定性增加, 冲突的可能性增大”。^[6] 对此, 新的观点认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国家间利益相互渗透, 相互依存日益加深, “安全困境”问题已经得到, 至少是部分解决。但是, 透视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 依然是以实力为基础的无政府国际体系, 权力政治依然主导西方世界的外交政策, 特别是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运用最为充分。所以, 实力依然是一国安全的基础, 实力对比依然是影响国家安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

二、地缘互动关系影响国家间的安全关系

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是有限的, 不能只根据双方的实力对比来判断国家面临的安全环境, 国家的态度和国家在地缘关系中的互动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处于一定地缘政治结构中的国家之间相互如何看待对方的力量及其力量的消长, 双方的核心利益是否冲突或冲突的程度, 彼此关系是友好还是敌对, 国家采取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的安全战略, 国家是更富侵略性还是乐于合作, 领导人的风险倾向、预期效用等都有可能使国家采取友好或敌意的政策。反过来, 一方的行为也会促使

另一方采取相应的对策,其结果可能是战争,也可能是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既是其本身安全环境的消费者,又是本身安全环境的创造者”,国家采取的安全行为不仅会改变自身的安全环境,而且将会改变其它国家的安全环境。^[7]可见,处于一定地缘政治空间中的国家之间的互动对国家安全环境的影响是深远的。地缘互动关系推动特定区域的地缘政治力量发生不同的组合,呈现出不同的地缘政治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缘互动关系是塑造地缘政治的主动因素。

国家在追求更好的安全环境的时候,通过发展自身实力,提升自己国家的安全环境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国家在发展自己的经济、军事能力的同时,必须注重提高外交的质量,通过展示友好的姿态、积极合作的态度,注重减轻自己追求安全的行为对它国的安全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来影响它国的态度和政策,塑造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安全关系,也为自己塑造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

三、地缘政治结构制约和影响国家间的安全关系

国家总是处于一定的地缘政治结构中。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构成结构,结构造就国家”,^[8]国家的行为总是受到结构的制约,并随着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根据自己属性的变化而变化。结构是原因,可以确定单元的形态,并最终使单元的运转产生某种性质相同的结果。^[9]地缘政治结构中行为体的数量及它们各自的实力,决定了行为体的互动模式。“刚性”的结构,一方面通过社会化进程限制和塑造国家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竞争来缔造一种秩序。^[10]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说过:“导致战争与和平的关键因素更多地取决于国际体系结构,而不是国家的性质。”^[11]因此,地缘政治结构对国家的行为具有总体上的约束力,它在较大程度上支配着国家之间互动关系,进而制约和影响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

反过来,国家也对地缘政治结构产生影响,结构与国家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首先,地缘政治结构由国家在一定地域空间中的实力分配,以及实力对比差异的程度造就,国家之间的实力分配决定了体系的根本特征。其次,国家之间实力分配关系发生变化,结构和体系也随之发生变化。一旦结构发生变化,行为体的互动模式也发生变化,并产生新的互动结果。阐明这一点目的是要说明,虽然结构对国家的影响是主要的,结构一旦形成,就决定了结构内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结构本身不仅包括地理因素,也包括政治因素,更确切地说是国家的决策者们怎样看待地理因素。国家面临的安全环境,它国的态度和意愿,存在的机会和限度,以及国家之间怎样互动。比如,国家可以建造高速公路、通讯网络等来缩短距离,以促成改变。“国家创造结构,结构也创造国家”,既然地缘政治的过程必须通过人类政治才能形成,看起来是必然的约束就可以通过人类政治加以避免,国家的需求与愿望会被注入到地缘政治的过程中,并给国家的安全带来勃勃生机。

那么,处于什么样地缘政治结构中,国家面临的安全环境会好

一些或是更差一些呢?肯尼思·华尔兹认为两极结构比多极结构稳定,冷战后虽然爆发全球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但是包括种族—宗教战争,由于国家分裂而发生的战争等在内的低烈度武装冲突的数量却在上升。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和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却认为,多极结构更为稳定,在多极结构下战争的频率和烈度都可能降低。因为,在多极结构下,国家拥有更多的选择,同时可以和许多其它的国家进行互动,并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和相互交织的忠诚。每个国家在决定是否战争之前,总要考虑这些利益和忠诚是否会受损,从而减少战争的可能。^[12]国际体系中对于“极”的争论,说明地缘政治结构并不能决定国家所有的政策和行为,但是国家间的安全关系深受地缘政治结构的制约和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国家必须根据所处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制定国家的安全战略和政策。

参考文献:

- [1][美]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5页。
- [2]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Arrangement with Basicbooks,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1998, p.38.
- [3]王玮:《地缘政治与中国国家安全》,军事谊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9页。
- [4]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186页。
- [5][意]尼可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 [6]Jacek Kugler and A. F. K. Organski, *The War Ledg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60.
- [7]参见唐世平:《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 [8]Kenneth Booth and Steve Smit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day*, 1995, p.264.
- [9][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4。
- [10][没]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9~101页。
- [11]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1) Summer 1990, p.5~7.
- [12]Karl W. Deutsch and J. David Singer, “Multipolar Power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World Politics*, X VI, April 1964, 390~394.